

HU QIANYING
SELECTED WORKS
O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F ZHOU CULTURE

胡谦盈
周文化考古研究选集



四川大学出版社



26.3232
H498
0036544

胡谦盈
HU QIANYING

周文化考古研究选集

SELECTED WORKS O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F ZHOU CULTURE

胡谦盈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 陈建明 张 晶
特约编辑 黄守君
技术设计 陈建明
责任印制 石大明

胡谦盈周文化考古研究选集

胡谦盈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望江路 29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南冶金地质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1/16 插页:14 字数:495千字 印张:26.375

2000年2月第1版

200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000册

ISBN 7-5614-1861-2/K·203

定价:120.00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收入 27 篇著作和 1 篇附录(录音访问:考古学家胡谦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广播电台《社会名流》系列节目)。本书选入有关西周、先周、寺洼文化、齐家文化、常山下层文化和中国古代建筑等不同课题的文章,其中以周文化著作为主。寺洼文化和周文化关系密切,而寺洼文化可能来源于齐家文化,常山下层文化则属于齐家文化的前身,有数篇文章论及这些问题。此外,《论窑洞——考古中所见西周及其以前土洞穴房基址研究》一文论述西周和先周的窑洞房基址,《南邠州·碾子坡》节选——第七编《结论》的主要内容是先周文化和历史问题。故本著作取名为《胡谦盈周文化考古研究选集》。书中文章大致分为不同的两类:一类是作者通过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取得的重大新发现;另一类著作是对新发现进行多层次的深入研究,见解独特新颖,在学术上自成一家之言。论著在考古理论和方法方面,也有某种补充和发展。

本著作各文附英文提要,《附录》有英译文章。全书约 50 万字,文物线图 111 幅和照片 98 帧。其中有很多线图和照片是初次发表的,如周都丰镐的夯土建筑基址,碾子坡先周文化夯土建筑基址和铜器窖藏,徐家碾寺洼文化殉人葬墓和彩陶器,等等。

本书可供考古学、历史学、古代建筑和美术史工作者阅读。

INTRODUCTION

The present collection includes 27 pieces of *Hu's* papers and an appendix [entitled as "An Interview with Archaeologist *Hu Qianying* (VIP—A Series Program by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collection covers different related topics such as *Western Zhou*, *Xian Zhou*, *Siwa*, *Qijia*, the *Lower Changshan* cultures and Chinese ancient constructions. The study of *Zhou* culture with 18 pieces of the selected 27 papers, forms the main part of this book. *Zhou* cultur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iwa* culture, which probably originates from the *Qijia* culture with the *Lower Changshan* culture, its forerunner. Besides, the paper "On the Cave Dwellings—a Study Based on the Foundations of *Western Zhou* and Even Earlier Earth Cave Dwellings Discovered in Archaeology" involves, in some respects, the foundations of cave dwellings of *Western Zhou* and its earlier period. "The *Nianzipo* Site in the *Nanbin* Area—Extracts from the Report *Excavations at Nianzipo, Changwu, Shaanxi, 1980-1986: Part VII, Conclusion*" mainly deals with the culture and history of *Xian Zhou*. So this book is entitled "Selected Works o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f *Zhou* Culture." The papers selected in this book are basically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one, deserving high academic values, is devoted to the new discoveries based on the author's planned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and excavations; the other deals with the deep exploration in these new discoveries. The views, which are clear, distinctive and original, open an academic school of his own. Furthermore, this collection provides us with some supplements to and developments in our conventional archaeological theories and methods.

Every piece of the papers here has an English abstract. The book has altogether approximate 500 thousand words with 111 and 98 line graphs of cultural relics photographs, in which many make their first appearance here, such as the tampered construction base at *Zhou's* capitals *Fengjing* and *Haojing*, the tampered construction and bronzeware kiln storages of *Xian Zhou* culture at *Nianzipo*, human immolation tombs and color pottery wares of the *Siwa* culture at *Xujianian*.

The present book is surely a helpful reference to researchers of archaeology, history, ancient construction and art history.

开创性的科学实践和成果

——《胡谦盈周文化考古研究选集》序

石兴邦

—

胡谦盈同志的力作《周文化考古研究选集》，即将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问世。这是周文化和周史研究领域里一件值得注目的好事、大事。这本书所包含的内容，是他数十年来研究周文化和周史以及其他课题的重要成果。在书里，他根据丰富的田野科学实践和敏锐的洞察力，深入地探讨了周文化研究中的热点和难点，以及与西北地区史前文化研究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解决并阐明了学术研究中的一些重大课题。本书的出版，无疑对推动和深化周文化及其相关历史的研究将大有助益。

胡谦盈同志这部著作，是至今考古界研究周文化唯一的一部综合性专著，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考古学为历史研究所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深为学林所赞许和称道。学问之道，和其他任何事业一样，其成果都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我们赞誉他在学术研究上的成功之美，而究其所以致之之由，却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我和胡谦盈同志从50年代初期就相识并相聚在一起，在考古岗位上风风雨雨地奋斗了几十个春秋。后来我到陕西，他的研究领地也在西安，不论他来西安，还是我去北京，我们常常见面，且多谈论学术问题。摆谈起来，他总是滔滔不绝地谈论他的“斩获”和心得。他才思敏捷，观察深刻，无论论衡文史，臧否得失，常能中鹄，且警语感人。在我们的接触中，我发现在他身上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的一些优良禀赋，也许这正是他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和建树的基本原因所在。

其一，尊师重道，闻道求知。

50年代初，谦盈同志以莘莘学子，就读于广州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从陈寅恪、岑仲勉、容庚、刘节等著名学者聆教学习，特别是得到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影响最深，深为大师那严谨的治学方法和博大精深的学养所奋感。到考古研究所后，他恭谨执礼，请教于梁思永（他和梁先生接触不多，但受其学术思想影响甚大）、夏鼐、尹达、陈梦家等诸位考古前辈，虚心学习考古学基本方法和知识，以及新史学理论。在前辈的教育和指导下，他虚怀若谷，谦而不盈，屡有悟教，窃以为善。从先辈那里学到理论联系实际的一套为学之道，视野开阔而学有专向。这样在学术研究征途中，渐渐孕育而形成了

他个人在治学方面的鲜明特点：即严谨的治学作风和善于通过田野考古实践，以解决学术上重要问题的理论和方法。

其二，勤于实践，功于探索。

他从先辈的教导和亲身体验中，深知考古学的生长点和学术生命力在于田野实践。所以从50年代初跻身于考古队列之时起，即奋搏于田野工作第一线。基于考古工作的特性及其广泛的涉及层面，他不失时机地抓住每一机遇，参加各种不同文化遗存的发掘研究实践，足迹达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一些地区。上自仰韶文化，下及汉、唐遗存，皆有所涉猎，但他主要开拓园地是周文化领域。开始醉心于丰、镐二京故址宝藏的寻寻觅觅，继而转到周文化渊源的探索，数十载躬耕不辍，天道酬勤，终致丰获，并在一些领域取得突破和创新。在周文化研究阵地上，卓然树一家之帜。

其三，善于思考，勇于创新。

他能将学到的教益，很快地应用于学术研究实践，而且转化得迅速而有效，日就月将地提出新的问题。因此，他涉足考古队列不久，即问津于这门学问的殿堂，并很快获得了登堂入室的门路。他在同辈中总以强者的姿态显露出峥嵘的头角。据我所知，他是考古研究所同辈当中，对考古学真谛有正确理解，洞悉其方法并用之有道，从而获得卓著成果的少数同志之一。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他独辟蹊径，择善固执地走自己的路。在这方面他有些恭而不谦，表现出他个人的个性和特性，这可能是他在学术上获致成果的关键之一。

二

从上面简单的提示中，读者当能了解他所以能在学术上作出贡献是渊源有自的。下面我将简要地谈一下本书为我们所提供的成果及其在学术上的意义。本书所粹集的是谦盈同志在考古学研究实践中，有所发现、有所创见和有所贡献的主要成果。这里包括周都丰、镐与先周文化的探索和研究，仰韶文化类型及发展规律的研究，寺洼文化和黄土地区史前洞室居址的考察和研究等方面。

（一）周都丰、镐的研究

周文化的研究是他主攻的方向和课题。他一踏上工作岗位不久，即有幸投入到丰、镐二京的发掘和研究之中：1954年春参加丰、镐地区调查和普渡村西周墓的发掘；1955~1957年参与丰、镐地区的大规模发掘，其中受考古队队长之托，主持了斗门镇发掘以及1957年秋张家坡的大规模发掘。在其后的工作中，他费了多年的时间，对丰、镐二京作了阶段性和规划性研究，采用科学的程序和方法，逐步地解决了一系列西周考古上的重要问题：

首先，在前人踏察的基础上，作了深层次的勘察和试掘工作。他利用地层探查方法，弄清了与两京有关的古代水道——丰水、镐水、镐池、彪池和昆明池的具体流向、

位置和范围等水文地理方面的问题。然后，根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实地踏查，考证出丰京的具体位置是在以沔西客省庄为中心的附近，面积约6平方公里；镐京在沔东的洛水村和白家庄一带，面积约4平方公里。在此基础上，更深入地探查出丰京的中心地区在马王村村北一带。而且还在客省庄南地发现西周和先周两种不同遗存的叠压地层，首次把西周和先周两种文化区分开来，为探索先周文化提出了依据和线索，这在考古学上是个重大的突破。最后，他从普查与试掘的资料中，确定了镐京的范围和中心位置，并根据文化层堆积与内涵，提出了周文化发展三期说，为丰、镐地区西周文化的研究揭开了序幕。

（二）先周文化研究及其相关周史的复原

在丰、镐二京考古研究取得成果的基础上，他的学术视野更为高远，转到更富理论意义和更深层次的研究课题，提出进行先周文化的探索和先周史的研究。他认为，周人历史文献记载甚简，要靠考古学来解决。其中：迁岐以前的周人无信史，需用考古资源来复原；周王朝建立时的历史也需要考古学的研究加以充实和完善。他的提议，得到夏鼐所长和胡乔木院长的赞赏和支持，并于1978年列入社会科学院的科研计划。后由他负责组织“泾渭考古队”，专职进行这一工作。由于他熟识情况，方法得宜，很快就取得了重大收获。

第一，摸清了先周文化分布地范围是在泾渭地区，其中年代较早的先周文化遗址分布在泾河上游，即周人早期活动的南豳和北豳地区。

第二，选择该地区有典型意义的碾子坡聚落进行发掘，获得一批典型的先周文化类型品（有陶器、铜器遗址、墓葬、碳化高粱谷粒……），基本认清了先周文化的特征和面貌。

第三，他根据碾子坡遗址的收获和层位关系，并参照岐邑和丰、镐文化遗存的内涵和先后关系，确凿地论证了先周文化发展的三个时期的论断。即：

早期：碾子坡早期遗存，年代略早于古公亶父，约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

中期：碾子坡晚期、岐邑先周早期，约在古公亶父至季历期间，公元前12世纪后期。

晚期：岐邑先周晚期、丰邑的先周遗存，约在文王至武王灭商时期，公元前11世纪。

碾子坡遗址提供的资料，使我们对先周文化的面貌有了清晰的概念和认识，确立了它在商、周考古学中的地位，为彻底解决这一难题创造了前提，可以说这是他为考古学研究建立的一大功绩。接着，他根据碾子坡先周文化研究的成果，进一步对姬周早期社会史进行探讨研究，写了《太王以前的周史管窥》等论文，试图对古公亶父以前的姬周社会面貌进行复原。在这里，他阐述了如下几个重要论点：

1. 这时周人已进入以农牧经济为主的奴隶制社会，能制造青铜器，有文字、占卜之俗流行。

2. 从墓葬制度特点观察，周人社会处于血缘同性葬（兄弟、姊妹）向姻亲异性葬（夫妇）的过渡阶段。

3. 姬周是戎狄族系的一支，擅长畜牧业。周人比较可信的始祖应是“奔于戎狄之间”的不窋，大约在周先王公刘时期在泾河上游才有较稳定的根据地，农业才较大地发展起来。

4. 周人居邠时期已沦为商王朝的附属“小邦”，在碾子坡先周文化中有着十分明显的商文化因素。这在学术上既澄清了过去把有与商器相似或相同的周器归入商文化的错误，同时也有利于今后更健康地开展先周文化考古研究工作。

总之，谦盈同志的上述研究成果，既把先周文化的年代及周人信史提早了 100 多年，同时也为今后探索年代更早的先周遗存及周人信史奠定了基础。

（三）寺洼文化的深入研究

他在探索先周文化的过程中，洞察到泾河上游先周文化的特点和地域分布，与寺洼文化有相当密切的联系。他根据调查中所获得的资料和线索，重点地发掘了甘肃省庄浪县徐家碾 104 座寺洼文化墓葬，获得一批珍贵的史料，写了《试论寺洼文化》一文。文章较前人的研究，有所深入，是至今研究寺洼文化最全面系统的有代表性的专题论著，对该文化的面貌、年代、分布地域及族属作了较深入的分析研究。文章提出：

1. 寺洼文化是分布在泾渭地区戎狄族先民所创造的文化，在西北青铜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2. 目前发现的寺洼文化晚期遗存，年代在公元前 21～公元前 11 世纪这 1000 年间的后段。

3. 它有独特的一套文化类型品。

4. 在泾河上游地区，寺洼文化和先周文化的分布区存在重叠现象，而且二者还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文化交流和融合现象。如：（1）两种墓葬的墓坑流行口小底大的覆斗状形制；（2）寺洼文化墓葬出土的青铜兵器有镞、戈、矛、镞等，其特点与周人的相似或相同；（3）在先周墓中发现寺洼陶器，而在寺洼墓葬中也有典型周式陶罐；（4）宝鸡周初墓葬出土的附矮圈足马鞍形口陶罐，应从寺洼文化同类陶罐递变而来，等等。依据以上诸点，他把寺洼文化作为先周文化渊藪之一，是有根据的。

（四）仰韶文化的研究

谦盈同志很早就接触了有关仰韶文化的发掘研究工作。他参加过半坡遗址和客省庄遗址的发掘，此外，还亲临庙底沟遗址发掘工地察看古物。所以他常常注视这方面的问题，特别重视仰韶文化各类型的特异性和地域之间发展的阶段性，并在研究中取得了富有新意的两项成果：

其一，发现了常山下层文化，认为它是仰韶文化在陇东地区发展的晚期阶段，并由此而发展为齐家文化。这是对过去把齐家文化视为马家窑文化马厂期继续的补充和纠

正，为这一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系列提出了新的看法和证据。

这个文化类型是他在陇东镇原县常山遗址发现和发掘的。常山下层堆积是较为单纯而颇具特征的文化类型，故名为“常山下层文化”。他在《论常山下层文化》一文中，对这一文化的来龙去脉作了具体分析和论证：认为它是仰韶文化在甘、宁两省（区）接壤地区的继续和发展，并与西北晚期新石器文化发生了交流、融合。常山下层文化有一组典型的文化类型品，既含仰韶文化的传统余韵（彩陶和红陶），又有龙山文化早期（庙底沟二期文化阶段）的一些特征，还有相当数量的西北青铜器文化中特有的（双耳罐、大耳罐）器类，聚合而成一个颇具特征的融合性的文化共同体。

其二，最早提出东庄村类型的重要性，即由半坡向庙底沟类型过渡的史家类型。50年代中期，对仰韶文化半坡和庙底沟两个类型的年代和性质，考古学界曾展开热烈的讨论。他虽没有参加讨论，但他参加过半坡和客省庄两个仰韶遗址的发掘以及参观和考察过庙底沟遗址的发掘收获，心中有数，因而时刻留神这个问题。1958年，当他负责黄河水库队山西分队工作时，即带着解决这个问题的意念走向寻求验证的实验室——广阔的田野工地。在调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选择永济东庄村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这个遗址正好是两个类型因素并存而交融在一起，当时他就提出是从半坡向庙底沟的过渡类型，并命名为东庄村类型。这在那时来说是很有见地的。可惜的是他的论说未能发表出来，连在报告中使用婉转语言表达上述意念的最有价值的文字也被删掉了。一直到后来史家类型成立后，他所提出的东庄村类型的观点才为大家所理解和承认。在科学发展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当一种真知灼见出现时，很难一下子为人们所接受，常为习惯势力或偏见所淹没或抑制，但真理的光芒，终究会闪射出它的光彩来的。

（五）西周及其以前土洞穴房基址的研究

最后，我要谈一下他对黄土地区最有特点的史前洞穴居室文化的研究。这一课题，虽为人们所忽视，但却是最有特点的地域性文化载体。他慧眼识珠，作了个案专题研究，写了《论窑洞——考古中所见西周及其以前土洞穴房基址研究》一文。这是至今唯一讨论这一课题的专论，对黄土地区这一有代表性的居室文化及其在中国民居建筑史上的应有的地位，乃至流传至今的现实问题，作了历史的考察和评价。根据他的研究：1. 窑洞居室，是根据黄土地区的自然条件，仿照天然岩洞的形式建造和发展的。从仰韶文化晚期开始一直至今，已有五六千年的历史。2. 其分布范围在黄河中游及其支流的地区，与古籍记载的穴居地区相合。3. 探讨了窑洞居室的形制、种类、时代特点及所在地貌的分布规律。今日居民采用的从崖面开大口挖窑洞及纵长使用面积的形制，起于石器时代末期的客省庄二期文化，迄今已有四千年的历史。

三

上面，我扼要地介绍了谦盈同志的主要成果的方方面面。这些成果多是有所发现，

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且在学术上有所贡献和建树的。读者如能细读原著，并加以类比，就会感知它在相关领域内的学术地位和意义了。

我们从这些论著中，以及它们形成的过程中，可吸取些什么值得铭记的启迪和教益呢？就我个人的体会而言，约有下列诸端：

首先，要以强者的姿态面对实际。我们为学之主旨是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当我们费了千辛万苦得到一些成果时，心中就感到无限的慰藉，特别是从事考古工作的朋友，这种感受最为真切。要进入这个境界，要经过艰苦而漫长的过程，其入门之法，是多实践，勤思考，细观察，并想方设法来解决实践中的问题。谦盈同志就有这种精神和素养：从丰、镐周都的研究而提出先周文化的探索和先周信史的复原；从半坡、庙底沟遗址发掘中得到的领悟而找到东庄村类型，都是在这一思维范畴内活动而实现的。往往前者是因，后者是果，根扎得越深越粗，果就结得越香越甜。我们在扎根育苗过程中要吃些苦头，但终会尝到甜头。当人们为其硕果赞赏而予以科学评价时，我们就会感到其苦有限而其乐无穷了。这个乐，不是个人一时一事的幸得之乐，而应是学界朋友同享成果的共欢之乐。

其次，要吸取持之有效的科学方法。从考古学的特点来说，就是调查研究的方法、实践验证的方法和综合类比的方法，总起来说就是辩证的历史的方法。做学问和打仗一样，要捕捉战机（学术上叫发现苗头，抓住机遇），获取战果，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而尤贵在用心之得，在细微处见功夫，关键环节显真知，见微知著，始能揭其奥秘。抓住一得之见，而追逐之，往往可致揽全局之胜。谦盈同志能取得如此丰硕成果，并能将纷歧错杂的泾水上游诸文化丛体梳理出脉络清晰、面貌清楚的序列，实得力于此。

其三，要有一定深度和高度的学养综合水平。要取得成果，必须具备一定的学养条件，这就是较深的理论造诣，丰富的科学实践（田野的和整理研究的）和扎实的专业基础，还可以加一条广泛的知识面。这几条加起来的综合水平越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可能性就越大越多。

对一个追求真理的学者来说，上述三点是相互系连而缺一不可的。我们的任务不仅是要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而且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提高我们的综合水平，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开拓新的领域以繁荣发展我们的事业。读者从本书的内涵及作者的从业实践中，当能吸取教益而有所作为焉。是为序。

1996年5月12日写于考古所

迁岐以前周人遗留及信史探索的科学实践

——南郊碾子坡先周遗址发掘亲历记

(代自序)

我是一个酷爱研究周文化的考古“迷”，数十年学术研究生涯的主要考古对象是周文化遗存及其历史。

从1954年春至1963年冬，我大部分时间在陕西省西安市西南的沔河两岸从事西周都城丰、镐故址的考古勘测与研究。其中，1959年春季在丰邑遗址内（沔河中游西岸旁）的马王村北地挖掘出西周早期大型夯土残基址（图版二，1、2、3、4）；在客省庄村南发现西周早期和先周两种不同遗存的叠压地层。这是丰、镐都址勘测和周文化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

众所周知，历史学家对周人起源及早期历史的研究长期存在不同看法，诸家的论说分歧甚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深究其根由，问题的症结是迁岐以前的周人无信史，需用考古资源来复原。所以，客省庄先周文化遗存的发现极大地吸引着我的考古注意力，心里常常盘算等待丰、镐都址勘测工作告一段落以后，去寻找周人迁岐以前的文化遗留及复原其相应信史。但从1964~1977年，因受种种因素制约，我要开展先周文化考古的意愿纯属个人在做“梦”。直到党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各项事业呈现蓬勃发展的兆头。已经年近半百的我，在思想上、精神上受到很大的震动、鼓舞和共鸣，心中重新点燃去找寻迁岐以前周文化遗存的熊熊火焰。其时适逢胡乔木到中国社科院任院长，我抱着“碰运气”的忐忑心情，鼓足勇气就先周考古课题毛遂自荐上书院长立“军令状”——说明考古对象、学术目的、要求及基本完成任务日期。我很幸运，课题提议得到乔木院长、秘书长兼科研局长刘导生和夏鼐所长的赞赏与支持，并于1978年秋季列入社科院的科研计划。后由我负责组织“泾渭考古队”，专职进行这一工作。

我队的调查和发掘工作，得到国家文物局及地方各部门的大力帮助。各地同志不仅在生活上十分关心我们，在工作上还无私地提供考古资料、调查线索和交通工具，并常和我们一起去调查遗址。真是感人肺腑，令我终生难忘。这样，我和白云翔同志只用短短一年时间，就在地貌复杂（多属山峦重叠、沟壑纵横交错地带），步履艰难的广大泾、渭地区完成了调查任务，行程数千里，踏察古文化遗址数百处，采集到大量文物资料，从而对先周文化遗存的分布及规律有了一个比较全面而深入的初步了解和认识。在此研究的基础上，我在周先王“公刘居豳”地区选择陕西省长武县碾子坡先周文化遗址和葬

地为典型，从1980年秋～1986年连续十一个季度进行大规模发掘，揭露居址面积达7000平方米。发现房址、灰坑和窑址等遗迹共298座，内有206座是先周遗存。发掘古墓葬共365座，内有232座是先周墓葬。出土和收集古文化遗物及器皿残片数量以万计，内百分之七十是先周遗物。初期有四人参加工作，1982年以后是我和王金龙二人。

遗址位于泾河上游一股支流——黑河北岸河旁高约35～45米的缓坡台地上（图二十五），地形东北高西南低。遗址面积约0.5平方公里，其南部边缘是高约35米的陡坡和峭壁，北缘与通往塬顶的陡坡相接，东、西两侧都是宽大的深沟。台地水土流失严重，地面上被冲刷出五条长短不一的宽大深土沟，加上修梯田和挖窑洞等因素，遗址的破坏十分严重，南半部的文化堆积已残留无几。与先周居址同时代的周人坟地在北边的陡坡上（图二十七），高出居址65～73米，坡长直线约400米。坟区面积约11520平方米，大量墓葬在筑土路和修梯田时被破坏，我们只掘出92座墓。钻探和发掘墓葬期间，我们每天从住处到工地来回走动多次，在陡坡上的崎岖坎坷羊肠小道上攀登10多里路，之后还要在烈日炎炎或寒风刺骨的情况下做八小时钻探或发掘工作，其艰难辛苦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但为了获取研究价值极高的科学素材（它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先周墓地，是研究周人早期埋葬制度难能可贵的科学资料），已经年过半百的我和40多岁的王金龙都是心情十分愉快，天天精神焕发和斗志昂扬地做艰辛的考古工作。

遗址是我研究和工作的重点。经过长达六年半的艰苦奋斗，终于初步弄清楚遗址中各种古文化的内涵、性质及其分布范围，并收集到异常丰富和宝贵的多种古文化实物资料。

遗址是由五种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文化层构成的：一、最早的是仰韶文化东庄村类型遗存，分布区在遗址中部，其中住地位北，墓区在南。二、年代较晚的是客省庄二期文化，仅限于在遗址西南部有暴露，我们在八个发掘区内都没有见到这类遗存。三、再晚是先周遗存，是遗址文化堆积的主要内容。先周居住遗存遍及整个台地，各种遗迹分布密集且包含物异常丰富。先周墓葬群位于遗址中部偏西，即我们的第一发掘区。塋区面积6300平方米，掘出138座墓，大约还有50～60座墓因农民取土遭破坏。墓穴均挖破先周居址，说明居址废弃以后那里又成为年代较晚的周人墓地。与塋地同时代的周人住地，我们在遗址及其附近2.5公里内的地段内都没有找到。四、再晚是西周遗存，主要是墓葬，位于先周墓区的北邻。塋地面积约915平方米，掘出47座西周墓。五、最后是春秋时代的义渠戎文化遗存，分布在遗址东半部，其中住地位南，墓地在北。其文化特征和关中地区秦戎文化无二样。所以，碾子坡发掘为说明我国古代两个不同民族（广义说的）之遗存，可以属于同一个谱系的考古文化提供了具体例证。明确此问题以后，在考古研究中正确地对待和处理好民族和考古文化的关系无疑是有参考意义的。

迁岐以前的周人遗留是我们寻找和研究的对象，也是发掘中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发现和收获。根据层位关系及陶器排列，先周遗存可以分为不同的早、晚两期。其中早期遗存年代为公元前1200年前后，内容有丰富的居住遗存和大批墓葬，使我们对先周文化

的面貌有了清晰的概念和认识，确立它商、周考古学的地位。晚期只发掘 130 多座墓葬，约属于周人迁岐前夕或稍晚的遗留，年代为公元前 12 世纪后期。

发掘先周居址遗迹 206 座。房址计 21 座，内有版筑房址 3 座，半竖穴房址 6 座，窑洞房址 12 座（图版七，1、2、3）。版筑房址的发现，说明史家过去引用文献主张周人迁岐以后才掌握版筑技术的论说是错误的。铜窖藏 1 座，出土 3 件大型铜容器（图版十二，1、2、3、4），它们是迄今发掘出来的年代最早的周人大型铜制品，是十分珍贵和不可多得的科学史料。灰坑 177 座，形状有圆形、椭圆形、长方形、长条形和不规则形等五种，它们都是岐、丰及其附近地区先周居址和西周居址中常见的灰坑形制。窑址 7 座，形制分两种：一种是“横穴式”窑址，在年代较晚的先周遗址和西周遗址中屡有发现。另一种窑址较大，形制似属初见。窑址是一个挖在生黄土里的圆形拱顶洞穴，穴底即置放陶坯的窑床。窑床前面是一个横向长方形的土坑火膛，坑口靠外部分是露天的。洞顶开辟 7 个圆形烟道通往地面上（图版八，3）。它和今日山区农村常见的洞穴式土砖窑的结构是基本相同的，后者当是先周陶窑的继承与发展。

这次发掘收集的先周文化资料，数量大宗且种类齐全，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周人生产、生活和文化等方面的活动图景以及当时社会的画面概貌。

一、经济结构是农、牧业并举。出土农作物有碳化高粱（图版八，2、5、6、7）。常见农具是各种不同形状的斧、铲、刀和镰等，以石制品为多，骨制品次之，没有发现蚌制品。这与西周时期大量使用蚌刀和蚌镰的情况是不同的。三穿石刀和安长柄的石锤斧是当时最具特征的农具，其中三穿石刀（图三十三，4）似有特殊用途，石锤斧（图三十二，1、2）直到西周时代还屡见出土，可见它是周人用来砍伐开荒的传统工具。居民食后残余——兽骨出土的数量特别多，内中牛骨占一半以上，说明当时以放牧牛群为主的畜牧业是相当发达的，它应是社会经济生活中一种十分重要的因素。剔骨取肉工具发现有各种不同形状的小石器、骨削和骨刀等，其中侧视形态像皮靴形状的骨刀具有明显的特点，迄今在黄河流域各种古文化中未见或罕见。

各种手工业生产遗存：制铜只发现铜器而未见其他现象，因此制铜业状况还不清楚。不过铜重器的出土，如一号鼎口径 30 厘米、高 41.5 厘米，重 10.3 公斤（图版十二，2），表明制铜业在当时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制陶业是最发达的部门，发现有窑址、制陶工具如陶拍和梳形骨器，以及大量器皿及其残片。制骨现象主要是发现各类不同形状的大、小磨石，以及有使用痕迹的骨、角器，如铲、凿、刀、锥、笄和镞等。纺织和缝纫工具有铜锥、骨针、骨锥、角锥和纺轮等，出土量较多，特别是陶纺轮不仅数量多，还有 58 件器物上有文字刻划，这说明纺织是当时较重要的手工业。编织业只发现席子灰痕，纹理和今日芦苇席子的编织方法雷同，说明当时的编织技术已达到较高的水平。

狩猎使用的工具有石镞、骨镞、角镞和石弹丸等，出土量较少。另外，属于猎获物食后残余如鹿等骨头也不多见，这说明当时的狩猎业并不发达。

捕捞工具和采集物的食后残余如田螺壳等物在居址中没有发现，这表明遗址居民没有通过捕捞手段去取得生活资料的劳动习惯，至少是捕捞业很不发达。此情况一直到西周时代也大致如此，这从丰、镐遗址大规模发掘中甚少见到捕捞工具及田螺壳等物，似得到了说明。

二、前述三类房址和不同形状的灰坑，是周人居住生活画面的缩影。在三类房址中，供“权贵”享用的版筑房址罕见，绝大多数是半竖穴和窑洞两种房址，这说明此时期的广大先周居民是处于穴居和半穴居的生活状态。此现象与《诗·大雅·绵》记载周人迁岐以前存在着“陶覆陶穴”的居住习俗是适相吻合的。灰坑分布在房址附近，其中圆形、椭圆形和长方形三种土坑的形制固定，是用来储藏东西的窖穴，个别土坑里残留有碳化高粱堆积。不规则形灰坑的大小深浅不一，它们原来可能是房子或窖穴，废弃不用以后屡遭破坏而面目全非。

人们日常使用的生活用具以陶器为主。器类有：甗、鬲、鼎、甑（炊器）、簋、豆、盂、杯、罐、甬（盛器）、盆、尊、缸和瓮（储器）以及附属于上述器类的器盖等 10 多种，其中以鬲、豆、罐、尊和瓮等器最为常见。

此外，还有吃食使用的骨匕、骨匙和插发用的骨笄等。

专供贵族享用的铜容器只出土 3 件，计铜鼎 2 件，铜甬 1 件。

三、卜骨是宗教信仰遗物，出土量较多，说明当时占卜风尚盛行。骨料多用牛肩胛骨，不去白角，有圆钻和灼而无凿（图版八，4）。

发现文字和符号 166 例，除 9 例见于卜骨和骨器上的以外，其余的都是陶文，均为阴刻。文字和符号在器物上大都是单个存在的，两个或多个连书的现象较少见，复合字更为罕见。文字和符号很多是重复的，按其内容大致分为不同的五类：1. 数字；2. 干支；3. 方位符号；4. 人名、地名、方国名、族名和族徽；5. 图形文字及其他。字体刻笔和殷墟甲文同类字相一致，可见商、周同文在公元前 1200 年就存在了。

茔地是先周居民思想信仰和埋葬制度的具体反映和写照。概括其要点是：

（1）坟地和住地分开，坟地选择在较高的坡地上。墓向特点是人骨架头在高处，脚朝低处，它似暗示人死以后仍像活着时候一样头在高位以仰视远方。

（2）流行单人土葬，墓穴为“直壁土圻”和“覆斗状土圻”二者并存使用，其中后一种穴形是周文化墓葬的一种突出特征。葬具流行用木棺以及在棺的上下盖席，个别的墓用石棺（图版十，3），少数墓残留有石棺葬子遗现象（图五十二；图版九，1）。实行男性俯身葬，女性仰身葬的制度。早期墓葬多无随葬品，只发现 5 座墓有 1 或 2 件陶鬲随葬。晚期无随葬品的墓罕见，绝大多数墓有 1 件陶鬲随葬，个别的墓加 1 件铜铃或铜铎。当时流行随葬乳状袋足陶鬲，随葬瘪裆陶鬲的现象少见，但两类陶鬲共生一墓的情况见于先周早期第 663 号墓。

（3）两个茔地都有分群埋葬死者的现象，另外还有一、二座墓是孤立地埋在茔区边缘的。前一种现象大概是死者分属于不同群体的缘故，后一现象可能是死者在族群上不

属于居民群体的一种反映，但也可能是他们的身份最低下或者因触犯某种族规，甚至其死因与众不同诸如此类的原因，故将死者单个埋在茔区外围，以示与众不同。据初步统计，两座墓左、右并列形成一组的现象在早期茔区发现 6 例 12 座墓，占墓葬总数（92 座）的八分之一强，其中男性组 2 例，女性组 1 例，异性组 3 例。在晚期茔地发现 11 例 22 座墓，占墓葬总数（138 座）的六分之一弱，其中男性组 4 例，女性组 3 例，异性组 4 例。可见，血缘同性墓组合和姻亲异性墓组合在当时是并存的。换言之，先周居民的埋葬制度，处于血缘同性葬向姻亲异性葬演化的重要过渡阶段。

总之，居邠周人不仅已经掌握铸铜技术和制铜手工业，同时也掌握了文字。社会占卜风尚盛行，而流行占卜既是迷信的一种表现，同时也是社会文明的一种标志。还有，居址中的居民出现贫富悬殊及不同阶级的现象已是十分明显了，如“富者”拥有版筑住房和大型铜器，而铜重器在我国古代社会里往往是主人地位显赫高贵的一种象征和标志。“贫者”则居住十分简陋的窑洞建筑，死后墓内无任何随葬物，据早期墓地中的墓葬统计，这类居民占百分之九十弱。上述诸点，都是人类步入文明历史——即奴隶制度社会的重要因素。可以认为，此时期的周人已经跨入奴隶制度的社会了。还有，根据碾子坡的发现，殷墟二期甲文上的“周”、“周侯”指的是西周之先人——即周是商的附庸“小邦”，大概是不成问题的。此点我在《南邠碾子坡先周文化居住址和墓葬发掘的学术意义》（1993 年西安周·秦文化国际学术会议论文）一文中已有说明，在此不再重复。

可以认为，碾子坡遗址提供的资料，不仅使我们对先周文化的面貌有了清晰的概念和认识，确立了它在商周考古学的地位，同时还把周人信史以及商、周关系史的年代往前提早了近 100 年。

（1997 年 6 月初于北京潘家园寓所，
政协文史办编写《新中国考古重大
发现回忆录》一书约稿）

附 记

“夏商周断代工程”于 1997 年 10 月在西安召开“先周文化会议”，我向会议提交 5 篇论文发给了与会代表，其中未发表的论文有：

1. 迁岐以前周人遗留及信史探索的科学实践
——南邠碾子坡先周遗址发掘亲历记；
2. 南邠碾子坡先周文化居住址和墓葬发掘的学术意义；
3. 商、周关系史和先周文化中的商文化因素管窥。

1999 年 5 月

目 录

开创性的科学实践和成果

——《胡谦盈周文化考古研究选集》序…………… 石兴邦(1)

迁岐以前周人遗留及信史探索的科学实践

——南郊碾子坡先周遗址发掘亲历记…………… (代自序)(1)

丰、镐地区诸水道的踏察

——兼论周都丰、镐位置…………… (1)

汉昆明池及其有关遗存踏察记…………… (15)

1961~1962年陕西长安沣东试掘简报…………… (24)

《沣西发掘报告》(1955~1957)读后…………… (33)

丰、镐考古工作三十年(1951~1981)的回顾…………… (42)

郭沫若院长来到我们丰、镐考古队

——深切怀念郭老…………… (54)

关于“殷人墓”的商榷…………… (61)

郭沫若论商、周人殉的基本观点…………… (68)

姬周陶鬲研究

——周族起源探索之一…………… (85)

姬周族属及其文化探源

——周族起源探索之二…………… (96)

陕西长武碾子坡先周文化遗址发掘记略…………… (106)

试谈先周文化及相关问题…………… (124)

太王以前的周史管窥

——周族起源探索之三…………… (142)

浅谈先周文化分布与传说中的周都

——周族起源探索之四…………… (155)